



加强团结合作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郑归初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全球性危机，不仅对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带来重大挑战，也加速百年大变局的演进。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人类前途命运站在新的十字路口。

直面疫情带来的深层次挑战

疫情造就世界新的“断层线”。疫情对全球生产和需求造成全面冲击，世界经济面临萧条期，互联互通大幅倒退。联合国预计，今年将有超过170个国家人均收入陷入负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0年世界经济将萎缩4.4%，世界贸易组织预计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大幅萎缩13%至32%。国家间内顾自保意识上升，单边主义、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横行，社会对立、种族矛盾等问题凸显。各国抗疫效果大相径庭，“群体免疫”“带疫解封”“疫苗无用”等论调甚嚣尘上，全球思潮乱象丛生。个别国家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大搞“认同政治”，叫嚣“文明冲突”，煽动民意对立、人为制造所谓“新冷战”，严重破坏国际合作。

全球抗疫绘出新的合作“银边线”。经济全球化顿挫但大势不可逆转，线上全球化成为更受欢迎的选择，展现新的商机和潜力。电子商务、流媒体、社交媒体等数字经济形态在疫情期间加速发展，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今年“6·18”购物节期间国内各大主要电商平台下单金额近1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30%。东亚各国率先控制疫情并开启复工复产，对世界经济复苏起到有力拉动效应。世界银行预测，亚洲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将在2020年首次超过50%，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将是2020年全球经济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区域。全球疫苗研发呈现积极进展，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

示，全球已有40种新冠疫苗进入临床试验，有效控制疫情前景可期。

共同体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跑线”。疫情以急迫而悲怆的方式将人类共同命运照亮。截至10月中



旬，疫情已造成全球超过110万人死亡。残酷的现实使各国人民警醒与反思，进一步认识到人类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疫情考验各国执政能力和全球治理体系，走多边主义道路、开展国际合作成为人间正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起更广泛国际共识。作为理念首倡国，中国疫情防控有力、经济复苏有效。第三季度经济增速4.9%，中秋国庆假期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6.37亿人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将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在进入临床三期的10种疫苗中，中国拥有4种，占全球40%。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作出贡献。中国在抗疫斗争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原则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以实际行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大推动力量。

以负责任大国担当 贡献中国智慧和 中国力量

当前，人类同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尚未结束，这场疫情也不会是人类面临的最后一次危机。国际社会只有加强协调合作，一道修复

“断层线”、放大“银边线”、站稳“起跑线”，共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才能取得抗击疫情的最终胜利，并不断战胜各种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将积极发挥自身的优势和作用，以负责任大国担当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彰显道义，引领抗疫国际合作。疫情不仅关乎中国人民生命和健康，也关系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安全和福祉。中国将秉持心怀天下的国际主义情怀和人道主义关怀，坚持正确义利观，“投桃报李”“救急救难”，继续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支持和帮助。我们将继续同世界卫生组织保持良好沟通合作，同各国分享抗疫经验和诊疗技术，确保全球抗疫物资供应链稳定，为全世界尽快战胜新冠病毒贡献中国力量。

倡导包容，增进思想理念共识。中国秉承“天下一家”理念，支持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让世界多样性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人类文明多姿多彩的天然形态。推崇“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坚持走多边主义道路，摒弃意识形态争论，跨越文明冲突陷阱，推动与各国一道，树立起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挖掘潜力，分享中国发展机遇。中国正在加快形成新发展格

局，不断释放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推进高水平开放，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带动世界经济复苏。我们将坚定不移同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携手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积极倡导共建“健康丝绸之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中国也将继续为推动全球治理模式创新提供更多思想公共产品。

深化合作，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将继续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精神，与美方共同建设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坚持中俄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向更高水平。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发展同欧盟的关系，推动中欧关系行稳致远。进一步践行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建设。继续尽己所能支持非洲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抗疫努力，助力恢复经济社会发展。

尊重科学，反对疫情政治化标签化。中国倡导坚持科学精神和实事求是态度，让科学问题回归科学，呼吁国际社会切断各种错误论调的逻辑链。同时要警惕比新冠病毒更具破坏力的“政治病毒”，坚决反对病毒标签化、抗疫政治化以及对特定国家污名化，坚决反对一些国家以邻为壑、隔岸观火的不负责任做法。

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影响，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各国人民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期待更加强烈。只要世界各国加强团结合作，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一定能够创造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



韩日关系会如何走向

□ 马维英

韩日两国因殖民历史、领土争端经常引发矛盾和冲突，韩国文在寅总统执政后，推翻了朴槿惠时期与日本达成的《韩日慰安妇协议》，并就日本强征韩国劳工发起诉讼索赔，没收日本在韩企业资产。日本也于2019年7月在贸易领域对之展开反击，实施对韩贸易限制，将韩国清除出“贸易白名单”。两国政府间的高层互动一度中断，陷入僵持与对峙局面。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双方禁止对方人员入境，商务通道也由此关闭。

韩日在各领域出现了互动迹象

最近，日本政局出现了新的变动，8月末首相安倍辞职，9月16日，原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被选为新首相。在韩国看来，这似乎为韩日关系改善提供了一个契机。韩日在各领域出现了互动迹象：首先，菅义伟就任当天，韩国总统文在寅即发去贺电，祝贺其当选日本首相，并表示韩方愿在菅义伟任期内与日本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增进沟通与对话，解决历史遗留问题。9月24日，日本首相菅义伟与韩国总统

文在寅首次通话，菅义伟指出日韩、日美关系至关重要，韩方需要善解决强征劳工索赔案相关问题，文在寅表示希望以菅义伟首相就任为契机，解决强征劳工索赔等两国长期悬而未解的问题。并强调菅义伟为共享韩日基本价值与战略利益的朋友、携手共建东北亚及全球和平繁荣的伙伴。9月末，韩日两国就放宽企业人士入境限制进行谈判，10月8日，谈判达成，韩日两国启动企业人士入境“快捷通道”，韩国成为继新加坡之后第二个与日本开通“快捷通道”的国家，两国停滯近7个月的双边贸易和人员往来开始恢复。

韩日关系转圜余地有限

韩日关系貌似正在恢复，但实质转圜余地有限。首先，菅义伟在竞选时就表明要继承安倍的外交政策，对韩日慰安妇问题、日本强征韩国劳工索赔问题，他在媒体上有明确表态，表示韩日间慰安妇问题已解决，韩日关系的基础应遵循《日韩请求权协定》，基本沿袭安倍首相的说辞。其次，菅义伟就任后，面对的內政问题更加急迫，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提振经济摆在面

前，外交问题不是优先选项。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日本经济已经持续三个季度萎缩，菅义伟执政后，最先提出的是经济领域的措施，包括扶持中小企业、降低税费、改革数字经济等。再次，日韩关系中，日本已占据主导地位，韩国寻求突破僵局的意愿较日本更强烈，这是因为文在寅政府在外交上乏善可陈，急需在任期结束前积累外交成果。韩国在业已宣布终止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后，又于2019年、2020年两次决定推迟废止这一协定，频频地向日本伸出橄榄枝，而日本在相关问题上坚持原有立场的意志非常清晰。因此，韩日关系改善的空间很小。

经贸领域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复苏”

尽管如此，韩日关系在经贸领域还是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复苏”，这符合双方当前的利益诉求。受新冠肺炎疫情长期拖累的影响，两国经济出现大幅下滑，在贸易限制之前，两国经贸往来密切，互为重要贸易伙伴，两国在汽车贸易、旅游等领域互动频繁，自2019年7月日

本对出口韩国的三种半导体核心材料加强管控，并将韩国移出出口“白色清单”后，韩国随之掀起抵制日货行动，韩日经贸关系一落千丈，当前两国急需恢复经济，部分恢复两国在优势领域的贸易，有助于双方经济的复苏。因此，放宽企业人士往来的限制，是两国恢复经济往来的一个信号。除了疫情的冲击，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也波及韩日两国。最直接的影响即美国的贸易禁令中断了日韩部分企业的对外供货，缩小了两国的市场，间接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关税壁垒上，它提高了韩企、日企的生产成本。因此两国都开始寻找替代市场，两国合作基础和优势使双方摒弃政治纠葛有限度地恢复经济合作。

对于韩日政治外交关系的改善，除了历史遗留问题，美国因素、朝核问题是制约双方关系走势的外部因素，是韩日关系发展中值得关注的变量。



瑞典是世界上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之一。自20世纪20年代尝试兴建“老年之家”以来，瑞典的养老服务体系经历了一个由家庭责任到公共责任、由贫困救济到普遍权利、由非专业化到专业化的发展历程，完成了从普及制、高福利制到以个人账户为基础、动态平衡的养老金收支体系的转变。

责任法定 分层管理

《社会服务法案》是瑞典养老服务的基础性法律，法案规定公众从国家获得必要的社会救助和服务是一项权利，政府满足公众所需的社会服务是一项强制性义务。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法案》《公共采购法案》和《自由选择体系法案》等配套法案为瑞典养老体系的构建和运行提供了系统的法律支撑。瑞典的三级政府——中央政府、郡议会和自治市政府在养老公共服务中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瑞典的公共养老服务资金的85%来源于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地方政府也承担了直接的、主要的养老公共服务。

瑞典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责是通过法律法规和财政调控手段促进、监督国家养老服务政策的实施。郡议会的主要职责是建设、管理大型综合医疗机构，负责老年人的基础健康护理服务以及急性身体和精神疾病的治疗，并为其提供财政支持。自治市政府承担最主要的养老服务职责，负责建设、管理社区医疗服务中心和养老机构，并对公共养老服务的效率和服务对象的满意度进行连续跟踪监督。

效率优先 动态平衡

在瑞典，服务对象支付的养老服务费用仅占总体养老服务支出的5%左右，这大大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21世纪初，瑞典每年用于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的总开支占到了GDP总量的35%左右。为了改变这一状况，瑞典实行了养老金名义账户制度。名义账户制包含名义账户和积累制账户两大部分，参保人缴费的一部分（2%左右）计入积累制账户进行实账运行，另一部分（16%左右）计入名义账户放入资本市场进行投资运营并可以获取投资收益。瑞典成立了专门负责养老金管理的养老金管理局，一方面规范积累制账户资金管理，另一方面专业运营名义账户资金。

在这一制度下，民众领取多少养老金取决于缴费累积数额及其投资收益，参保者当期缴费与其退休后能领取的养老金数额具有强关联性。这样可以促使缴费者把缴纳养老保险作为一种储蓄方式，减少提前退休行为；以国家名义进行的养老金投资大大提高了资金回报率，这样可以鼓励缴费者把缴纳养老金作为一种投资行为，减少改革阻力。为了持续推动改革，瑞典采取了“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新进式策略，实现了养老保险制度的平稳转型。

在名义账户制度下，政府利用收入指数、管理费用、平衡比率、平衡指数、年金除数等精算要素，提高了名义资金积累和待遇发放等各个环节的精准性，为实现财务平衡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养老保险制度具有较强的财务稳定性。当遇到经济低迷、经济换挡和人口总体转变时，自动平衡机制会被激活，以确保养老保险财务基本平衡。

按需提供 医养结合

瑞典老年社会政策和社会服务的宗旨是尊重并保持老年人的权利，确保老年人在退休后能够积极生活，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保持独立和尊严、能够获得良好的健康和社会服务。在瑞典，所有具有相同养老服务需求的民众，无论其收入水平或购买力如何，都可以享受平等的养老服务。公共养老服务按需分配既是对民众权利的保障，也是公共部门确定养老服务对象的依据。为了满足老年人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瑞典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引入市场力量，并激励以家庭养老为主要方式的非正式养老服务，实现国家、市场和家庭在养老服务供给的有效互补，形成居家养老、机构养老等多种养老模式。

瑞典政府优先支持居家养老。居家养老得以实现的根本是“医养一体化”服务的便利性和高质量。政府为

瑞典养老体系： 按需供给 注重效率

□ 贺莉

居家养老者提供了一系列便利措施，设立功能齐全的家政服务系统。家政服务公司为所有居家老年人提供全天候服务，满足老年人的所有需求，提供送餐上门、打扫卫生、陪同散步、娱乐运动、精神慰藉、安全警报、交通出行、房屋改造和家庭护理援助等服务。

当居家养老不能满足养老需求时，瑞典的老年人可以选择机构养老，申请“老年住房”或“专门住房”。“老年住房”由私人运营，“专门住房”由政府运营。无论是在“老年住房”还是在“专门住房”养老，老年人都可以向政府申请家庭护理援助服务和家庭医疗护理服务。这两类养老机构还为老年人提供公共厨房和餐厅等社交场所，开展音乐、电影、阅读、绘画和其他文化活动。除此之外，还有“集体之家”可供选择。“集体之家”主要面向认知受损的老年人，每个“集体之家”通常安排6位左右的老年人居住，每位老年人可拥有独立房间，可使用公共集体区域。

“疗养院（养老院）”是另外一种公共养老机构，主要服务于基本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孤寡老人和患有严重疾病的老年人。“疗养院”配备有专职护士，当地医院的医师也定期到养老院巡诊、给老年人做身体检查。“疗养院”为老年人提供内容广泛的专业医疗护理服务，包括满足基本医疗需求、治疗老年痴呆、临终病患护理等。

注重培训 服务专业

瑞典具有重视养老服务专业人才培养的传统。在瑞典，养老服务监督者和管理者都要在大学接受专业培训和教育，基础护理和服务人员也都要获得专业的护理资格证或助理护士资格证。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养老人才专业培训机构由郡议会的培训学院发展到国家的高等学校，有越来越多养老行业从业者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在高等教育系统，社会服务监管是一门专业学科，在全国范围内招收本科生甚至研究生。同时，这一专业将老年病学作为基础课程，帮助学生提高养老服务行业的专业能力和素质。

近年来，养老服务需求的激增进一步产生了对专业人才的需求，而政府也积极回应，更加重视对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的培训，并根据需求的变化不断调整培训课程的内容。瑞典对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的培养，为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使养老服务从准入到服务评估的整个过程都具有高度专业化的特征。

